

“冷门题材”短视频背后是对社会生活的热关注

□黄启哲

10分钟一集的《了不起的村落》聚焦中国乡村,唤起大众对美丽乡村的关注;二更视频聚焦当代中国的普通人、身边事;《造物集》向都市人传递生活美学……眼下,一批具有人文情怀、视角独特的短视频进入公众视野。

不仅社交平台与新闻网站将短视频作为新的流量驱动引擎,更多人也从“140字文字分享”迈入“300秒视频分享”的社交模式。经历了一年多的爆发式增长后,短视频势头依旧不减。根据最新一期《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5.65亿,其中手机视频用户规模为5.25亿。一家旗下拥有众多短视频产品的平台,其日均播放量总和已超过100亿次,来自用户个体与机构日上传视频数达到2000万个。

在业界看来,野蛮生长长期过后,短视频正迎来精耕细作的稳步发展期。市场的自我净化淘洗,加之网络视频行业内容管理的进一步加强,令短视频从单纯的恶搞、娱乐,到垂直化、人文化、专业化,逐渐找到其健康发展之路。

300秒的视频可以拍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放在两年前,答案可能还集中在娱乐八卦、生活技能分享这些关键词之上。而到了去年,短视频的题材大大拓宽。古村落、校园保安、大排档老板等冷门题材或擦肩而

过的平凡人,都走进了短视频的镜头。

从中国最后的驯鹿养殖部落鄂温克,到原住民世居的兰屿,以短视频形态推出的《了不起的村落》选择把镜头对准中国的十个古村落。或壮美或秀美的中国乡村景致、充满地域特点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些需要更多年轻人接力传承的特色传统文化被一一呈现。视频于2017年11月上线,前三集即获得超过千万的播放量。相比刷屏朋友圈的热门旅游景点或炫技搞笑自拍,古村落的短视频可谓“冷门”,却收获了许多用户的点赞。与此同时,如何唤起更多人对乡村和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成为热话题。

社会变迁往往蕴藏在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之中,这也成为短视频拍摄的发力点。校园里的保安大爷、夜市大排档老板等每天擦肩而过的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去年暑期,二更视频与部分高校举办“发现家乡不知道的美”原创短视频征集大赛。在参赛视频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大学生陪着生病的爷爷到医院看病,无意中发现了急诊室的男护士这样一个群体,以他们为主角拍摄的短视频。年轻人的镜头或许稚嫩,但他们却有着独特的视角,往往能以一个很小的切口,关注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拍客时代”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网络直播相比,短视频的技术门槛更高,其传播不是转瞬即逝的。为追求产品更多

的播放量和更长的生命周期,对内容制作有了更高要求。于是,镜头中的冷门乡村和平凡人,因精耕细作而更有感染力。

在过去一年,随着专业团队的集中涌入,电影级的画质、用心的布光和精致的配乐成为热门短视频的“标配”。在一支专业制作团队中,摄影摄像、剧本策划、导演、演员、剪辑……一个都不能少。制作周期也从十几天到几个月不等,极端一点的例子,一个不到120秒讲述美食制作的短视频,其制作团队仅拍摄就花了三个星期。

团队和硬件的升级带来的不只是观赏体验的提高,更对短视频包含的信息量和内容深度提出进一步需求。此前,有平台为拉动流量,推出低俗恶搞视频,但短时间的新鲜感过后,很快陷入雷同空洞的困境,令用户失去兴趣。而依靠配音对口型、为音乐配动作等视频应用新玩法,也由于复制者众多而分散了热度。在业界看来,短视频虽然是碎片化时代的产物,可与之相对应的,是欣赏方式为创作者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只有“每一帧都有信息量”、充分调动用户的情感的优质内容才能脱颖而出。未来,致力于发布有用信息、提供专门知识、帮助解决问题的优质短视频将成为主流。

也难怪有人下了这样的论断:从直播平台堆出的泡沫最终在短视频沉降,而从草根里“涨”起来的流量,最终还是流到了承载优质内容的大池子里。

【荧屏背后】

《风筝》链接了我们对英雄的向往

□张斌



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正如蒋方舟在与日本作家西木正明的文学对谈《何为文学——在事实和真实之间》中所说,残酷的事实远远比作家的想象更有力量。这也是作家无限接近真相的书写之使命。

主持人白岩松曾在书中说过:“虽然在行动上,是看日本、看美国,实质上,是看中国,看我们未来的路。”蒋方舟旅居日本也是如此,她眼中的“流亡者景观”,她关注的生命个体,也是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个出口、一种借鉴。当然,她的人性叩问不是为了批判什么,而是勇敢地直面,就像她对弱者处境的反思,以远藤周作《沉默》中的洛特里哥和格林的《权利与荣耀》中被处决的牧师为例,从中窥见向上攀援的精神信念:对公平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对弱者的同情、对艺术的热爱。“就像在东京度过的这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入,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因为人性进化得很慢,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精彩,唯有在看不见的屏障中认真地活着,独立地行走。

行走在蒋方舟的东京文学地图上

□钟倩

230年前,37岁的歌德带着行囊逃向意大利,一年零九个月的旅途中,他说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成为一个平庸风雅的公务员的车轮上解救下来;100年前,36岁的日本散文家永井荷风漫步于东京的大街小巷,写下《东京散策记》;2016年,27岁的蒋方舟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前往东京旅居一年,回来后就有了《东京一年》这本新书。

《东京一年》收录了蒋方舟旅居日本一年中的46篇日记。阅读的过程,就像是行走在蒋方舟的东京文学地图上。一年的时间不算长,她对生命的思考和人性的探讨却是深刻的、独到的,甚至尖锐而直戳痛处:“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说,“你无法理解她对底层、民间、民族、国家的那种与年龄不甚相符的关注与忧虑,你也无法理解她对时尚、潮流的领新与领悟,乃至对于两性、家庭、婚姻和仇怨,她都有自己独有的见解和坦荡。”蒋方舟的旅居充满独立思考和真诚对话,绝不逊色于阿城的《威尼斯游记》和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

日记中笔墨最多的就是看展览。从六本木的森美术馆看村上隆的《五百罗汉图》,到表参道的根津美术馆;从三岛由纪夫文学馆看原稿,再到比较

偏僻的神奈川县美术馆叶山分馆看芬兰女画家的作品;从东京都美术馆看伊藤若冲,看川端康成的展览,神乐坂新潮社120周年展览……扑面而来的异国情调,细腻清晰的文化感受,别具一格的审美精神,使人恍若置身其中。蒋方舟擅长的文学思维和人性洞察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濑户内海的艺术祭,临海观澜使蒋方舟想起《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少年,更多的是被隔离后的自我回归,“看山看水,其实是以山水的目光看自己,看自己的短视和狭隘。”而位于靠海梯田中的丰岛美术馆,宛如一颗水滴,被她称为最柔软的建筑,“所有人都如痴如醉地趴在地上观察水珠的滚动,我第一次发现水是这样的,像毛毛虫一样拉伸自己的身体,追赶同类,渴望和它们融为一体。因为受倾斜角度和环境影响,水珠经常在半路停止了流动,我发现自己竟然握着拳在给它们加油。”这与其说是艺术带来的馈赠,不如说是拥抱自然的体验。

除了行走于各种展览之间,蒋方舟的东京文学版图上更多的是对世相的观察和对人性的叩问。最令我震动的是蒋方舟对生命个体的同理心和体察力。日本年轻人闯入残障人安养院杀死20多人,她“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的行为”,由此联想到二战大屠杀并进行深度阐述,“只有直视人性异化

谍战剧的精神和价值基点,无一例外建立在忠诚和信仰的基础之上。《风筝》自然也不例外。但这一次,导演兼主演柳云龙对信仰的刻画,让人物走出了一条异常坎坷却让理想光芒四射的道路。该剧对于谍战剧在思想高度和艺术类型上的表现与探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以说,这一只永不断线的风筝,链接了我们对英雄的向往。

谍战剧虽然人物关系看似复杂,但核心的冲突反而比较单纯,通常体现在敌我双方的对立中,但《风筝》却设定了一个与此不同的极端复杂和多元的冲突情景。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18年的高级谍报人员郑耀先(代号“风筝”),不得不披着心狠手辣的军统六哥的狼皮,人称“鬼子六”——因为只有“比军统更军统”,才能在敌人的心脏立足。在不断有同志死在鬼子六手上的“事实”面前,不知其身份的我党地下力量反复通缉追杀鬼子六。这样让观众颇为惊奇的反常故事情节,将郑耀先置于三方力量间,并进一步落实在“风筝”和“影子”对垒中。忠诚和信仰的考验,已经不主要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或者说来自历史命运的考验。郑耀先最大的恐惧,不在于生死,而在于死后被永远扣上屠杀同志的“鬼子六”的帽子。《风筝》要回答的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因而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探求色彩。

郑耀先在接受潜伏任务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背负上了永世不被组织认可的可能。这就是说,无论做出了多大贡献与牺牲,自己都有可能化为尘埃永埋黄土,且被同志永远误解。这种献祭充满了难以救赎的悲壮。

郑耀先的大部分人生无时不处在生死的危境中,且要面对错综交叉的真假情感。《风筝》充分展现且张扬了情报人员这一特殊职业和群体的复杂交错和难以言说的人性世界。“我是谁”的问题不仅是郑耀先的终生难题,也是所有情报人员共同的难题。

但如果仅仅如此,该剧则难免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和相对论的泥潭。《风筝》分明在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纠葛之上,那不可混杂和抹杀的,依然是无比深沉的信仰。这信仰,造就了屏幕上的英雄,升腾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峰值。也许,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和体会这种信仰的力量,但《风筝》对信仰的推崇却仍然链接了世俗对英雄的向往,带给这个群体中大多数平凡的个人以超越性的怀想。

相比《暗算》,《风筝》的故事构造其实比较冒险。柳云龙的谍战剧,向来并不以场面和行动化的情节取胜,而在于敌我双方智慧的对垒,习惯的是斗智不斗勇,需要依靠情节编织、影像表达和心理能量的不断螺旋积累形成爆点。这种特点,更适合《暗算》这样人物、时空和情节都相对集中的故事,在环环相扣的发展中不断形成高强度的情节和情感的双重聚焦,以叙事黑洞吸纳观众的理智与情感,把他们牢牢绑定在自己叙事的轨道上难以离开。《风筝》的故事,则具有较大历史跨度,从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形成空间的几次转移,从山城到延安再回到山城等地。同时,在人物关系的设定上,处于多方力量拉扯中的郑耀先在不同阶段和时空环境中要面对不同的矛盾,这不得不让剧中的戏剧冲突聚焦不断转换,观众的观剧心理也要不断重新对焦。

尽管《风筝》仍存在着种种问题,但这不妨碍它成为近几年来比较出色的谍战剧作品。该剧对人性之上还有信仰的表达、对情报人员特殊人生和世界观的呈现、对谍战剧一贯的考究以及制作的精良,都使得越来越走向偶像化的谍战剧寻回了一些它应该有的质地。可以说,对于《风筝》以及今后的谍战剧,信仰的线不会断,艺术创造的线不能断。